

情报生涯三十年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科尔比回忆录

纪 晴 译

.2
00

群 众 出 版 社

情报生涯三十年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科尔比回忆录

(美) 威廉·科尔比 著
纪 晴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HONORABLE MEN

My Life in the CIA

By

William Colby
and Peter Forbath

本书根据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78 年版译出

情报生涯三十年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科尔比回忆录

(美) 威廉·科尔比 著

纪 晴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3印张 319千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贵州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145 定价：1.15元

印数：00001——80000册

译者的话

本书于一九七八年第一次在纽约公开出版，它是一本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内幕的比较系统的历史资料。它对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冷战时期中央情报局怎样充当美帝国主义国际宪兵工具；对了解六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受到的冲击；对研究美国情报机构和情报政策的演变；特别是美国今后将怎样重振中央情报局以同苏联抗衡，都很有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威廉·伊根·科尔比，一九四三年参加美国战略情报局。后来担任过中央情报局的驻外站长、处长、副局长。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是美国情报界资历最深和最有争议的一个局长。

科尔比在本书中记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他两次亲自率领敌后活动小组空降到法国和挪威德占区组织敌后抵抗和破坏活动的惊险经历；介绍了他一九五一年到瑞典建立斯塔的纳维亚地区秘密反共情报网和一九五三年被派到意大利阻止意共在大选中获胜的经验；为他自己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八年两次到南越扶持吴庭艳、阮文绍傀儡政权的“成就”辩护，把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归咎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特别是国务院和军方的矛盾。书中也具体介绍和分析了中央情报局如何策划“猪湾事件”和暗杀阿连德总统；如何破坏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遏制共产主义；以及中央情报局同苏联克格勃斗争的成败。

书中还系统地介绍了自一九四二年美国成立战略情报局以后中央情报机构在历届政府中的发展、组织分工、任务、管理和工作程序，叙述了它如何进行隐蔽活动，怎样获取情报和如何分析、核对、分发情报以及它在各个时期里同其他情报部门或行政部门的关系。对历届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杜勒斯、麦科恩、

雷朋、赫尔姆斯、施莱辛格等和美国情报界的重要人物如杜诺万、威斯纳、安格尔顿、兰斯代尔以及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基辛格等政界头面人物的工作和性格，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由于越战失败、水门事件等原因，在统治集团中发生了纷争，中央情报局卷入其中，成为全国和新闻界的揭发和围攻目标。科尔比被迫对中央情报局三十年的工作成败作了全面的检讨，并对美国今后的情报工作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虽然不乏自我表白之处，但也相当充分地反映了他力图“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挽救中央情报局危机的立场。

目 录

前 言	情报生涯的结束·····	(1)
第 一 章	空降敌后·····	(15)
第 二 章	是搞情报工作还是当律师·····	(44)
第 三 章	在斯堪的纳维亚做间谍工作·····	(63)
第 四 章	在意大利的隐蔽政治活动·····	(91)
第 五 章	越南战略村·····	(119)
第 六 章	在华盛顿任职——一场秘密战·····	(152)
第 七 章	西贡的政变和混乱·····	(173)
第 八 章	打人民战争·····	(206)
第 九 章	“凤凰计划”与“和平”·····	(227)
第 十 章	变化中的中央情报局和水门事件·····	(248)
第十一章	“家庭珍宝”·····	(282)
第十二章	中央情报局局长·····	(301)
第十三章	调查中央情报局·····	(334)
第十四章	侥幸过关·····	(366)
尾 声	宪法监督下的情报工作·····	(391)

前言

情报生涯的结束

飞机刚过午夜后降落在华盛顿国家机场，这已经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那是星期天。我是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回来，去那儿是为了同来访的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进行一次礼节性会晤。上一年去开罗时，我正式拜访过他；为了和基辛格对埃及友好的政策相一致，我想当他来美国访问时去表示一下我的敬意。但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巴巴拉·沃尔特斯捷足先登，并且超过了她预定的时间，因此我始终没能见到他，对此我也只好泰然处之。很明显，埃及总统认为，通过沃尔特斯小姐的电视采访把他的信息传达给美国人民，要比跟我泛泛地谈谈情报事务更为重要。对于他的选择我无可非议。然而，我只得在他的下榻处外面悄悄地坐在汽车里等了整整一个下午和晚上，直到埃及保安人员和我一致同意取消了这次拜会。现在我很高兴又回到了华盛顿，期待着一个美好的星期天的到来。我的妻子巴巴拉和我打算去做弥撒，然后去郊外野餐，或者骑自行车沿着运河一游。但是并未如愿。

当我下飞机时，在佩其航空公司外面用汽车等着我的保安官员递给我一份急件：要我不论多么晚到达，也要给总统顾问约翰·马什挂个电话。汽车里有电话，但为了安全起见，我走到机场大厅公用电话间里去打。马什正熟睡着。我为扰醒他表示了歉意。他说没关系，问我能否在当天早晨八点到椭圆形办公室去一趟（这意味着要跟总统见面）。我说当然可以。马什说那好，到

时候见，就把电话挂上了。

在平日，当总统召见时，我总是要先问问是什么事，这样可以对要商讨的题目预作准备。但这回我没有问。显然马什是想接着睡觉，我自己也累了，想快点回家上床。此外，要谈什么事我大体也可以猜得出来。前一天，也就是星期六，新闻报道揭露了中央情报局秘密援助伊拉克库尔德族叛乱分子的事。那天整个早晨，我们都在白宫地下室例会上谈这些泄密的事，所以总统准又是在召集一帮助手来讨论怎样防止这类机密材料泄露出去的问题。所有照例要到的人都会在那儿，我估计会有斯考克罗夫特、布切恩，五角大楼的很可能是施莱辛格本人、迈克·杜瓦尔，可能还有唐·拉姆斯费尔德，再就是马什和我。

但是他们并没有到场。除了在边门值勤的保安人员外，在那个星期天早晨七点四十五分，白宫西翼是空荡荡的。当我进去时，椭圆形办公室的外屋也没有人，马什随后才来。我原来的猜测很显然是错了，但我仍想试试看。

“嗨，杰克，那件库尔德的事真够呛，是不是？”我说。马什不经意地点了点头。我又说，“我敢说准是众议院的委员会搞的。”马什耸耸肩膀，眼睛望到别处去，明显是不想接着谈这件事。我又随便说了几句，心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话题放下了。我们沉默地站在那里，很尴尬。

八点整，福特总统来了。他是从白宫住宅沿门廊穿过玫瑰园来的，没有看见我们就径自进了椭圆形办公室，两个保安人员伴随着他。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来请我们进去。

福特坐在宽大漂亮的总统写字台后面，看起来有点沉闷。因为这天早晨晚些时候他还要飞到佛罗里达去会见萨达特，所以在他面前有一本厚厚的介绍中东形势的黑皮材料。见马什和我进来，他就把材料放到了一边。一年来我经常见到总统，但我们之间谈不上有什么私人关系。福特虽然总是很热情，但对我相当注

意礼节。这次他没有站起来，我们也没有握手。我说道，“总统先生，早晨好！杰克说你想见我。”

“是的，”他回答道，并让我在写字台前的直背椅子上坐下。“我们打算对国家安全结构作些改组。”

他用不着再多说一个字了。从他那句话里我立刻明白我为什么被召见了：我即将被解除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

福特没有把话说得那么直。按照处理这类棘手问题习惯的政治传统，福特说他要我担任一个新的职务：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使。然后他勾画了一下他心目中的改组轮廓：人事上的大换班。这次改组后来被叫做万圣节大屠杀，其中包括施莱辛格从国防部长职位上下台和撤回洛克菲勒做一九七六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陪福特竞选的决定。当时，福特并没有对我说要打算对施莱辛格怎么样，因为他还没有对施本人谈过。但是他告诉我，在改组计划中，基辛格将放弃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务而专任国务卿；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接过基辛格的总统助理职务。他还告诉我，乔治·布什将从中国回来接替我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我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选。这是我的心里话。

他接着动员我接受北约的职务。他说这是唐·拉姆斯费尔德来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以前干的工作。显然他是急于要我接受——如果不是为了别的理由，也不外乎是为了使他那政治上爆炸性的人事变动进行得顺利和不遭反对。但是我会接受吗？

“这件事我得考虑一下，总统先生，”我回答道，“我要跟巴巴拉商量商量。”我说，我确信他会理解我，因为对于这种影响到夫妇双方的事，他也是常同他的妻子商量的。同时我还说我对这个职务有些保留意见，譬如我很担心，提名一个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任驻北约大使会有什么样的不利政治影响，它会在盟国引起政治示威，这些国家的政府也会因此而对这项任命取不赞成的态度。

福特马上想法来说服我。他说我不必担心，因为这跟当总统私人代表一样，用不着北约国家同意。

“这个我知道，总统先生，”我说，“但是我仍然需要好好考虑一下，并且同我妻子商量商量。”

“好吧，”福特说，“请尽快让我们知道你的决定。”

“好的，先生，我会的。我等会儿在上午就跟杰克联系。”我说道。福特说人事变动要在星期一正式宣布，要我在这以前不要对别人讲。我答应了。

再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我站起来，会见结束了，一共花了大概十五分钟。就在这十五分钟里，我作为一个情报官员的三十年生涯突然结束了。

我应当是很沮丧的，但我那种总去想下一步该怎么办的老规矩占了上风。我得截住巴巴拉，她就要离家去城里做九点钟的弥撒了。我们得合计一下怎么对待去当北约大使的建议。当马什和我一起离开椭圆形办公室时，他急切地问我：“你会接受这个职务的，是不是？”这说明在他看来，能顺利地进行改组和在向报界公开宣布之前所有角色都能愉快地配齐是何等的重要！我当时就怀疑我是否会听命。（后来，我发现施莱辛格也没有听命，他甚至气冲冲地拒绝了福特要他去当进出口银行董事长的建议。）

除了这一任命可能在欧洲引起的消极反应外，我还顾虑到一些别的事情。譬如，我怀疑在基辛格任国务卿时，我能否在这个职位上做任何事情。尽人皆知，他是宁可自己办外交而不愿意通过大使们的。还有，任期可能很短，因为总统距离一次吃力的竞选只有一年的时间了。

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些话对马什讲。跟他分手后，我在接待室给巴巴拉打了电话。我正好在她要离家前截住了她，要她放弃我们原定的活动，等着我，因为我俩有要事得商量。当我匆匆走向白宫西翼的地下室出口时，碰上了施莱辛格。他有点惊讶地问

我，“你这个时候到这儿来干什么？”他显然完全不了解情况，我想也不该由我对他去讲，所以我只说是为了库尔德事件的泄密问题，便匆匆地走了。

回到家里以后，我同巴巴拉商量好了就给白宫打电话。马什已经陪总统起飞到佛罗里达去见萨达特了。白宫电话员把我的电话跟空军一号接通，当马什来接电话时我对他讲，“杰克，回答是‘不’，顺致敬意和感谢。”“好的，”马什说，“我去跟总统讲，很遗憾。”

这件事办完后，巴巴拉和我便开始通知我们的家人。我们跟住在家的孩子克里斯廷和卡尔讲了。给住在纽约的儿子乔纳森和他妻子苏珊打了电话。还给在杜兰大学的儿子保罗也打了电话。我们去看望了巴巴拉的母亲和我的父母，他们就住在附近。当我有点时间来仔细回顾所发生的事情时，我突然发现不论是我的家人或我自己，对此都不感到惊讶。实际上我早就在等着这一天，只是硬着头皮干了将近一年。这是中央情报局在它历史上受到最严厉的公众审查的一年，这一年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全部花到对付无数的国会调查委员会会议上去了。这也是美国情报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的一年。

这一年实际上是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纽约时报》刊载了西摩·赫什指责中央情报局进行了“大量的非法国内情报行动”的报道开始的。当然，在这次危机之前，早已有了一些根源：如越南战争、水门事件、智利政变等。这些问题从不同方面提出了使美国公众烦恼的事，使中央情报局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行动遭受激烈的攻击，进一步把中央情报局从它想呆的默默无闻的隐蔽处拽了出来。

但是，赫什的报道成了顶峰。《纽约时报》的标题——《据悉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内大量进行反对反战力量和尼克松时代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引发了一场风暴性大火。因为在

报道中，所有多年积累起来的对中央情报局的可怕的恐惧和怀疑一下子都明朗化了。报道把这个政府机构说成是个患杀人狂的恶魔、盖世太保；它侵犯着美国人民的基本宪法权利。它使人想到了这是一桩跟刚刚迫使一个美国总统为免于弹劾而辞职的同样大的丑闻。

宣传工具象对待水门事件一样，紧紧抓住中央情报局不放。其他的报道如洪水般地涌来，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指责中央情报局进行同等惊人的活动。政客们、社论撰写人和普通公民都要求中央情报局必须终止它的凶残犯罪活动。形形色色毁灭性罪名的帽子扣到了中央情报局头上；它被说成是一头管制不住的“野象”，是对基本自由的一种威胁，是一个必须加以摧毁的弗兰肯斯坦怪物^①。调查马上就开始了：常设的各个国会情报工作监督委员会开会了；福特设立了一个以副总统洛克菲勒为首的总统特别委员会，来具体调查《纽约时报》指责的中央情报局的非法国内侦察活动；参众两院成立了各自的专门委员会来检查中央情报局所做的几乎一切其他事情。孕育新的和美国式情报工作的一年——对我说来是当情报官员最后的一年——开始了。

那是个令人疲惫不堪的一年。每星期我得去国会山花上整天整天的时间，面对着许多小时的敌意质询，努力使情报局的功过得到正确的评价，在答复国会根据宪法权利提出的问题和保护合法的情报机密之间的夹缝中穿行。我必须对不论我说什么或者没说什么都有可能成为第二天报上耸人听闻的标题保持警惕。与此同时，在兰利的总部里，中央情报局还必须在大漩涡中继续保持看来好象是还有效的工作。我得防止对过去的调查和轰动的新闻报道把我们的工作人员搞乱，破坏他们完成当前任务的能力。我必须答复年轻干部们提出的指责：他们认为他们受了骗，而且被

^① 在英国作家M.W.雪莱一八一八年所著小说中，一个生理学研究着制造了一个怪物而自己被他毁灭。比喻自己创造而又无法控制的人形怪物。——译者注

引入了歧途；答复高级干部们提出的指责：他们认为被出卖了。我得对报纸上可怕的最新标题、干部们提出的问题，其中包括象“我该怎么对我的孩子们讲呀？”这样的问题一一作出回答。

我记得，在我不平静的情报生涯中最烦乱的一年里，我曾预料到当调查一告结束、新闻界和政治上的暴风雨终于减退之后，我几乎肯定会被解职。处处都是征兆。报纸的标题和文章不断预言这种前景，不止一次传出消息说白宫正在物色接替我的人。我承认，在心灵深处我不愿发生这样的事。我愿意继续当情报局长，我有不少新的想法想应用到美国情报工作中去。但实际情况则是：在那个星期天早晨福特真把我叫去之前很久，我就应该明白——即使我自己执意不愿承认这一点——只有出现奇迹才能使我不致被解职。

为什么呢？理由很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理由都是正当的。譬如，就拿官方的理由来说吧，我一点也不怀疑福特真想改组国家安全结构，至少要改组到把施莱辛格弄走（因为他的性格和他对防务的观点跟总统的或基辛格的都不一致），以及把洛克菲勒从竞选名单上去掉（除掉这面对共和党右翼说来是红色的旗）。我也没有怀疑过福特和他的顾问们希望如果宣布受清洗的人员（其中包括我）更广泛一些，那么这些有争议的措施造成的政治喧嚣就会缓和下来。还有更为明显的理由是：在出现了中央情报局的破坏性揭露之后，政治上聪明的办法是任命一个新的局长来表明已同阴暗的过去划清界限，而转向了新的大有希望的未来。因为共和党人不想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陷入轰动一时的中央情报工作泥潭中去。

但是，不管上面这些理由多么有说服力，在我看来，它们都不是我被解职的主要理由。我认为我之所以去职，是由于我对中央情报局危机的处置方式。我对危机的处置不论在做法上或是认识上，都是同总统和他的主要顾问们相抵触的。在他们看来，我

在那动乱的一年里没有作为白宫“班子”里的一个忠诚成员来行事。

我的战略当然得受宪法的指导，应用宪法的原则。这就意味着我得同调查合作，尽可能使国会、新闻界和公众懂得美国情报工作，懂得它的重要性以及它的成就和失败。我认为，中央情报局的生存来自谅解而不是敌意，基于常识之上而不是信仰之上。我认为这用不着暴露那些真正需要保守的机密就可以办到，包括用不着暴露那些秘密为我们工作的美国人和外国人的名字，以及那些如果向对方暴露就马上会变得毫无用处的机密的技术手段。

基于这样的认识，当赫什最初打电话给我说他知道一件“比南越麦莱事件还要重大”的事的时候，我同意和他见面。后来我也没有直接否认他指出来的那些认为中央情报局在国内的活动是错误的指责，而是设法把他发现的事情排了排队，说明中央情报局违犯了立法规定的事情数目远远少得多，而且还都是发生在几年前，并在许多个月前就制止了的。当赫什终于把消息公之于世的时候，我口授了一个给总统的报告，在不直接点名的情况下详述了整个事情，还附上了一张便条，建议马上把这个报告向报界发布，认为这是反驳赫什的歪曲和夸大的最好办法。

后来，在此后举行最初的几次国会委员会会议中，有一次主席要求把我的证词——我回答赫什文章的详细提纲——向报界发布，我同意了，并且在另一个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上当着报界和电视摄影机又把它重复了一遍。当那些特别调查委员会成立时，我打电话给他们的主席们，说我希望同他们建立一个合作的而不是对立的关系，因为使国会和全国了解中央情报局活动的真正情况，符合大家的也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利益。

不但如此，我还对中央情报局里的同僚和部属们讲，调查工作肯定会查出想查的各种问题，我们唯一妥当的对付办法是提供补充根据，使查出的问题不致被夸大。因此，局里指示全体职员

对过去的任何可疑的事情都要上报，以便中央情报局能自己去报告，而不是被得意洋洋的调查员们揭发出来。所以，当一瓶早已忘到一边的蛇毒和准备用来发射它的模样奇特的弩枪（根据一项命令这类东西应当销毁，保存这种毒品和枪是违反这一命令的）被发现时，我们就先后向白宫和各个国会调查委员会报告了。后来他们还用这件事来搞了一场戏剧性的公开听证会，而实际上这件事是我们自己揭发的。

至少有多半的白宫人员和情报界的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我的做法是不支持的。他们愿意用的办法，说得直率一点，就是进行阻碍，暴露得越少越好，以使他们得以脱身。对于他们设法否认的事，就叫喊说，讲出去有损国家安全——一句话，跟我的做法恰恰相反。我必须承认，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事情会是这么样。

基辛格直截了当地批评说，他认为我应当马上发表声明断然否定赫什的报告。我要求把我给总统的报告公开发表，但这一建议如石沉大海，而白宫反倒决定用成立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的办法来遏制危机。我认为这些问题早晚得公开地而不仅仅是关起门来进行回答。在我刚向洛克菲勒副总统任主席的那个特别委员会首次作证后不久，他就把我拉进他在行政大厦的办公室里，以他最可爱的态度对我说，“比尔，你真的必须把这些材料统统提交给我们吗？”当我经常到参院专门委员会作证之后，有一次在讨论情报活动的秘密会议上，基辛格拿我的天主教信仰来讽刺我说，“比尔，你知道你去国会山干了些什么？你是去忏悔。”斯考克罗夫特由于出身空军和对总统指挥结构的矢忠，没有绕圈子，他干脆说我应当拒绝回答国会提出的问题。

对于我的处置方法，在情报界内也有同样的问题。象行政官员一样，许多情报官员争辩说，情报工作纯属行政部门的职能，不能让国会插手调查。别的人警告说，不能把情报机密信托给国

会，向它说等于向公众说一个样。曾一度任过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詹姆斯·安格尔顿对报界说，有些官员违犯了他们保护情报来源和工作方法的法定义务。我知道他是在指我。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传言，说我正在干的事是为了把危机转嫁到我的前任理查德·赫尔姆斯身上，以便解救自己。

过了不久，我就感到非常孤立。福特和他的助手们决定，他们最好的政策是把白宫同中央情报局的难题摘钩，从而减轻他们对中央情报局过去有问题的做法和现在的坏名声应负的责任。我同意他们的做法，并且认为应当由我来承受一切。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加深了我的孤立，就象当年征服西部时那样，车队围成了一个圆圈，而我则被留在圈外。

在这一过程中，我也犯了一些错误，例如在报告白宫之前就同意参院公布我的证词。《纽约时报》第二天的头号标题和全文报道对白宫来说虽然并未引起惊讶，但肯定导致了他们对我和国会的交往加紧了战术上的控制。即便事实上是这份报道葬送了那个所谓进行“大量的非法国内情报活动”的指责，并且明显地使赫什未能再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但它未能软化白宫的强硬路线分子。有些早报的专栏报道白宫正在找人替换我，这清楚地说明了我并不属于白宫的“班子”，并且提醒了我：一旦时机到来，我肯定得离职。但这也增强了我继续执行我认为是正确的战略的决心，这就是尊重国会的宪法职能，并继续进行斗争以向公众说明，过去情报工作中的错误同它对国家的贡献和必要性相比较，究竟是怎样一个比例。有的人特意对我进行鼓励，例如沃尔特·蒙代尔参议员在一次白宫放出风声之后把我拉到一边，叫我坚持照该做的去做。

虽然承受了压力和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但我现在和那时一样，对我所做的事情毫不后悔。我反倒比以往更坚信这不但是正确的做法，而且是唯一的做法。

从战术上讲，谁也无法阻碍国会的讨论。当然，往昔的情况并非如此。那个时候传统的概念认为情报工作是总统专管的事情，是一件必须在绝密条件下办的事，而且是一件国会不该去操心的事情。人们只要回想一下当年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权力很大的约翰·斯坦尼斯参议员，直到一九七一年还讲过这样的道理，他说，“间谍活动就是间谍活动，你必须打定主意要有这么一个情报机构并且保护它干这个事，还要闭上眼睛，不管出什么事情也得受着。”在能说象这种话的日子里，很明显，总统和他的中央情报局长不但可以用反对国会讨论的手法解脱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应当这样做——并且还可以指望取得国会领袖们的支持。参众两院委员会的主席们会听总统的，会立即制止国会插手他们认为是属于行政特权的任何企图。

但是到了一九七五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揭示了行政机构在分权和特权的外衣下，可能实际上已干下了可怕的滥用权力的事情。一九七四年刚选上的新参议员们坚持认为新的一天已经到来。国会已不打算再听命于总统。事实上，在赫什的文章发表前几个月，国会已迫使尼克松濒于遭到弹劾而辞职。有了新的生力军的国会是不会允许自己对中央情报局的调查落空的。在众议院里，中央情报局多年的老朋友和支持者爱德华·赫伯特已不再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了。在参议院，过去保护过情报工作的肯帮忙的主席们和有影响的议员们对我说，其他委员会提出情报机关在其主管范围内是怎么做的问题时，我必须予以答复。

如果我抵制国会的话，国会的传票就会象洪水一样向我们涌来。我们不愿意讲出去的情况早晚也会从我们这儿泄露出去，只不过是用水最糟的办法泄露出去罢了：一旦泄露出去，就会引起对我们的一系列怀疑，认为我们想掩藏一些东西，怀疑我们为什么要掩藏这些东西，以及还有什么骇人听闻的秘密掩盖着等等。主